降低行政成本:当代中国政府施治的重要趋向

叶勇,文宏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在党和政府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在整个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针对公共行政所面临共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体制性障碍要素的滞后影响,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具有开放性和可调节性的行政成本管理和控制体系,这对我国政府适应环境的需要,完善治理理念和实践,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行政成本;生产理论;行政体制

中图分类号:D6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6)06-0678-06

行政成本是指政府在为组织与管理社会而行使其职能的过程中所耗费的各种资源,以及由其所引出的现今和未来一段时间的间接性负担。其分析方法是政府对行政过程所投入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后果所进行的分析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归纳出一种普遍性的规律或模式。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种研究方法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它不是对政府及其行政过程的哲学思辩和推导,而是针对具体的客观存在所进行的科学考察和分析。

按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人类社会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能够提供的物品是稀缺的,社会必须有效地利用它们的资源。政府及其行政活动是一个支配与消耗社会资源的过程。从理性的角度看,政府的每一个活动都不应该是不计投入的。政府耗费资源数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社会资源总量的平衡,进而成为制约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种对资源的耗费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是否存在某个临界点?这种资源的耗费对政府会产生什么影响?行政成本投入与效益产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在何种情况下政府对资源的占有和支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些都是成本分析方法试图要探索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成本运转的现有状况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履行某种职能所带来的收益和花费的相关成本无法量化,更难直接挂钩。政府的这种特性导致现在还没有哪一个政府能够拿出有关其政府每年的投入、产出以及亏赢等等的分析报表出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行政成本的理由。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和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对政府工作的收益和相关成本进行模糊的核算,政府的收入与支出通常可以与往年相比较,这样就可以相对评价出行政成本的高低问题。当代中国行政成本的现实情况如何?下面将通过列举大量典型的数据素材予以充分揭示:

(一) 政府财政支出总量与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六五”、“七五”、“八五”、“九五”时期分别为23.2%、17.7%、13.0%、14.5%,2000年为17.8%^{[1](67)}。从国际比较看处于低水平,从变化趋势看也符合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但这不能反映真实的行政成本状况。目前的预算规模只是整个政府收支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预算外收支、制度外收支两部分,账外账、“小金库”普遍存在着。三块加在一起才是政府收支的全部。预算外部分还有一个大体的数字,制度外部分根本就无法搞

收稿日期:2006-10-19

基金项目: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06CZZ007)。

作者简介:叶勇(1978-),男,湖南宜章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2004级行政管理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方法。

清楚,有资料表明三部分各占1/3,整个政府收支占GDP的比重就是50%以上^[2]。这个规模在国际比较中就是很高的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肩。而且,财政支出在结构比值上出现了不够合理的现象。一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支出最多。2003年,经济建设费用支出为7410.87亿元,而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它支出分别是6469.37亿元、1907.87亿元、4691.26亿元、4170.58亿元^[3]。这说明我国依然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的职能还没有转变到位。二是行政管理费增长率最高。1978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只有4.7%,2003年则高达19.03%^[4]。

(二) 表面缩减的政府机构与真实的财政负担令人堪忧

中国的行政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的改革,而不是精简公务人员数量的改革,更不是压缩行政支出、降低行政成本的改革。2000年,财政供养人口4290万人,其中行政人员988万人,事业人员3292万人,按该年党政机关10043元的平均工资计算,一年的人头费就是43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13380亿元的32%^{[5][42]},使我国本来就有限的财力更加捉襟见肘。另从《财经时报》获知,就在2002年中央政府决定将某事业单位“按照市场化原则推向市场”时,有关职能部门为此花费了100亿元人民币的“改革费用”^[6]。许多专家对机构精简所出现的“成本问题”提出了质疑。“如果花几十亿人民币减掉一个政府部门,从表面看机关人员是减少了,可支付如此大的成本代价值不值得。精简机构的目标到底是人数还是费用?”

(三) 政府自身名目众多的管理费用严重失控

我国政府自身的管理费用一直由财政大包大揽,许多支出鱼目混珠,公私不分,吞噬着国家大量财富,导致政府行政费用连年攀升。其一是公务用车。官方媒体报道说,国内党政机关每年的公车耗费超过年度国防开支,同样养一辆车,消耗是社会车辆的6-8倍,效率却只有出租车的1/5^[7]。其二是公款吃喝。有人统计,我国一年花在吃喝上的公款消费超过1000亿,里面隐藏着许多被挥霍的过度消费和由公变私的个人消费。其三是会海难填。会议常年不断,屡开不凋,而且出现了无所谓、无成效、无准备、无决议的“四无”会议。据报载,由各级政府召开的会议不少于一亿个,每天30万个,仅会议差旅费就达500亿元之多^[8]。其四是政府采购。各级政府一年采购数千亿,有的因采购方式不当,导致费用

过高;有的因计划不周或盲目采购,购而无用或而不用,造成浪费。

(四) 政府决策失误所渗透的成本代价无法衡量

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为的高度权威化,政府决策的成功与否是影响行政成本的主要因素。国家审计署审计数字表明,2002年1月到11月,全国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金额超过2000亿元,其中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严重,仅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等,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就达72.3亿元^[9]。某些部门和个人高度垄断、控制信息和权力,甚至公然搞“愚民政策”,“暗箱操作”,寻租活动猖獗,致使决策出现偏差和纰漏,直接看是加大了行政成本,间接成本则无法衡量。胡鞍钢认为,我国因腐败而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在90年代后半期保守估计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12570亿元之间,要占到GDP的13.2%至16.8%^[10]。这个数字相当于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

二、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缘由

面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也处于实质性阶段这样一种严峻的情形之下,要求控制行政成本的呼声日益高涨。那么造成我国的行政成本不断攀升的缘由是什么呢?我们将从公共行政“生产理论”^[11]的制约及体制性障碍要素的滞后影响这两个层面来探究。

(一) 公共行政“生产理论”的制约

公共行政“生产理论”旨在对行政产出及其生产过程相关的内容进行合理缜密的探索与研究,而提炼出来的一些能为公共行政学研究所借鉴应用的某些微观基础的理念和方法。在其理论框架中,标明了行政产出及其测量困难的特征,并展示了行政产出的生产具有高度垄断性以及行政产出与成本之间关系微弱等内部属性,提供了对行政成本不断增长的充分解释,更确切地说,这些内容本身就隐含着释义行政机构具有缺乏成本意识、低效率的可能性的依据。

首先,行政产出及其测量困难。行政产出是指政府部门投入一定的资源,经过复杂的生产活动后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由于政府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服务并不进入市场的交换领域,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货币价格直接标示其生产的机会成本。所以,政

府部门的产出是一种“非市场产出”,^{[12](45)}要对其进行准确测量在技术上无疑存在着相当的困难。此外,由于难以获得全面、准确的关于消费者(公民、私人企业等)消费行政部门产出的有关信息,要准确测量行政产出的质量也是极为困难的。总之,行政产出的测量困难直接影响到对政府部门绩效的评估,反过来,容易放松人们对衡量绩效的一个重要指标——行政成本的讲求。由于目标模糊,会使得行政成本的高与低、利与弊的界线也变成一种说不准的感觉。

其次,行政产出的生产具有高度垄断性。由于政府部门是公共权力机构,其所提供的产出或服务具有“非拒绝性”^{[13](31)},即无论公民是否愿意,都必须消费政府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仅从这点便可以凸显出政府部门的垄断地位及其政府行为的垄断特性。垄断意味着政府组织不面临竞争的威胁,使得政府部门的生产过程缺乏一个有效的刺激结构,从而无法有效刺激行政人员的劳动投入,也不能刺激政府部门节约成本。一言之,垄断性政府部门最容易偏离政府领域的“消费者主权”原则,从而出现各种低效率状况。美国学者萨瓦斯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公共部门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平均比承包商提供服务的成本费用要高出35%—95%”^{[14](59)}。

再次,行政产出与成本之间关系微弱。这也是“非市场产出”的一个典型特征,正如沃尔夫指出的:“非市场活动割裂了这种联系,因为维护非市场活动的收入具有非价格来源:即来自政府的税收,或来自捐赠或其他提供给政府的非价格来源。这些收入直接提供给政府或政府之外的其它非市场机构。”^{[12](46)}政府部门作为一个公共权力机构,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而不是来自经营收入,政府部门的生产成本并不需要由其产出来弥补。即政府仅仅是行政成本的制造者,行政成本最终承担者是社会及公众,而不是政府自身。这样,行政产出的生产缺乏盈亏底线那样的硬约束,而且会出现极为明显的“多余成本”,政府会以追求规模、消费扩张作为最大化目标,而不是以成本极小化作为衡量标准。

(二) 体制性障碍要素的滞后影响

所谓体制是社会系统组织整合的框架结构,行政体制则是细化为实现政府能力的制度平台,其自身的形成和运作对建构政府管理创新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致使我国行政体制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缺陷,也造成了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弊端症结之主要所在。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权力界定失度。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高成本运转,主要是由于政府未能真正转变职能,没有剥离不合理的权力。政府职能庞大和权力膨胀意味着行政资源配置是粗放型配置方式,走的是一条外延扩大的路子,造成了行政领域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职能不清,权限不明,角色错位等问题由此产生,如果不对职能和权力进行根本性的收缩和改革,重新规定其合理范围和数量,那么,就难以理顺与市场、企业、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使行政资源的配置与政府职能严重不对称。该加强的部门不能及时强化,如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研究咨询部门职权空乏疲软、人员编制少、经费拮据紧张;而本该弱化的却没有削弱,一些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在体制改革中,换汤不换药,穿新鞋走老路,从事着低效或无效行政行为。这些都直接影响了行政效率,也直接带动了行政成本的上升。

第二,政府机构调整失控,编制管理混乱。我国传统的政府组织是科层制“金字塔”式的垂直结构,极易导致机构臃肿。纵向来看,包括中央、省级、市级、县级、乡镇政府五个层次。城市还有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下面还有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即村委会和居委会。众多的行政层级容易出现信息链障碍,导致组织协调不畅和反应迟缓。横向来看,本应当由一个部门管理的事由几个部门分管,造成组织重叠,出现责任不清楚,互相推委扯皮。另外,人员编制管理方面缺乏硬约束、硬保障,人员的增减往往是领导“一支笔”审批了算数,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总之,我国在机构编制方面长期以来存在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由于新旧体制的交替作用,多元利益格局的不断分化,在现阶段,中央与地方、党与政、条与块、部门与部门的关系更加难以协调,由此衍生了政策摩擦、职责摩擦、制度摩擦,各级政府在协调中往往左右为难,前后受阻,消耗了大量的行政资源。

第三,行政管理方式落后,政府运行低效。一方面许多政府部门和地方仍习惯以“内部文件”、“行政命令”等随意性大、透明度低的管理方式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出现了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不当利益合法化的非正常现象,进而导致滥用权力、权钱交易、以权设租等消极腐败问题。完整的政府行政运行包括决策、执行、监督三个部分。在决策阶段注重的是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在执行阶段强调是要提高效率;而在监督阶段则是要强化行政监督的力度以及犯规的惩罚力度^[15]。正由于行政管理方式的不配套,我国政府行政运行环节出现了不平稳、不协调的状况,因而使得相关具体措

施更多的是一种表层概括的政策选择而非成熟高质量的制度规范,个别资源要素在作用过程中有始无终。这三种形式的断档,直接导致了行政资源诸如制度、人员、设备的闲置与沉淀,“十羊九牧”,人浮于事,有法无“法”等现象就会应运而生,大量资源就不可避免地在空耗中流失,造成了行政成本的不断扩展。

三、降低行政成本的有效路径

中国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都需要在一个综合、系统、权变的视角中重新考量并做出回答。行政成本问题也不例外,应该系统有效地从体制转轨和技术推动这两个影响因素来看清楚成为我国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瓶颈”制约的根源,进而实质性找到医治沉痾痼疾的良方。

(一) 体制转轨

体制转轨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我国政府体制一直体现着复杂的内容和鲜活的思想这一明显特性,行政功能、行政结构以及行政运行三者关系模式的优化与完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展开,为此,对许多行政体制问题发生的机理做出合理的解释,便能获得解决我国政府低成本运转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1.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权力

转变政府职能、界定政府权力是降低行政成本的一个基本前提。重点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企业、社会、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政府能力的转换与提高,即政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的提高,逐步具备规划协调能力、利益综合能力、价值分配能力、监察监督能力、保障服务能力等^{[16][17]}。具体来说,政府应当在公共和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福利和保障、法制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同时,政府要有意识地培育社会中介组织,提高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扩大社会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为政府职能的转移提供承接载体,以形成“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大保障”的格局^[17]。目前减少行政审批是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调整和规范政府权力的途径之一。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各职能部门相继公布了取消行政审批的项目,如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已先后取消了上百项审批项目。按照这种要求,引导和梳理行政资源的投向、流动和组合应以政府职能及其权力的界定、变迁为依据,要在消费资源和发展资源中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从而提高行政资源的利用率。

2. 着力推进机构改革,加强政府编制管理

行政机构设置以及人员编制是控制行政成本规模的必然渠道。具体来说,加强机构编制管理,确定全国政府机构层次和各级政府机构内部层次,下大力气对政府机构进行“减肥”和“瘦身”,实现“扁平化”。另外,加强人员编制管理,通过职能职位分析,确定编制数额及人员结构,控制人员总额,精兵简政。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机构管理,实现政府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法定化。按照这种要求,在我国行政体制下努力形成集权和分权适度的、逐级分权相结合的、纵向贯通、横向联结、程序简明、权责适当的现代行政组织结构模式,以理顺行政机构职能、权限和责任之间的关系,确保发挥各自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又要确保它们都能受到相应的责任约束。上对下负责就是要防止政出多门、政府打架;下对上负责,就是要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左右配合,就是要相互沟通、相互补台,以避免结构摩擦造成的资源流失。

3. 科学完善管理方式,促进政府高效运行

政府在进行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应完善行政管理方式,这是实现我国有效管理和控制行政成本的手段。各级政府部门应当摒弃陈旧的管理方式,由权力行政转向规则行政,从随意裁决转向依法办事,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尝试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政府行政过程应当是透明的、可预见的、公开的,要建立信息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决策听证制度以及行政问责制度等,对如何改善政府服务质量和行政相对人参与问题作出回应,拓展公民参与途径,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美国学者威尔逊指出,造成较为成功和不那么成功的政府机构之间差异的首要因素是机构运行的制度。唯此,通过改善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及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运行机制,从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加强对行政运行的考评,才能满足政府过程中法制的规范性、组织的协作性、管理的灵活性的要求,保证决策的正确性、执行的时效性、监督的有力性,才能调动政府各部门的竞争活力和效率动机,减少内部的摩擦成本,实现政府运行的高效益。

(二) 技术推动

较之体制性障碍要素短期内的难以克服,审视技术要素本身应有的推动机能,我国政府则有较为广阔的施展空间。行政成本问题牵涉到了财政预算、电子政务诸种方面,依靠各种具体政策以及合力的支持与激发,才能保证行政成本管理和控制目标的实现。

1. 规范财政开支,强化预算约束

规范财政开支,最紧迫的是将预算外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到预算控制之内,形成真正完整的政府预算,统一财政。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实施预算制度改革,如建立部门预算制度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实施零基预算等。财政部预算司也正在做预算编制方法的调整,新方法将突出表现预算分配与部门履行职能直接挂钩,即将部门职能按年度量化,真正实现财权与事权统一。政府各部门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经费使用,必须在预算的范围内进行。行政预算必须由各部门提出,经编制部门审核,报国家权力机关详细审议后批准。这种预算硬约束机制的确立和强化,将有助于从根本上控制和降低行政成本。其次,要完善政府采购制度。近几年财政支出居高不下,与盲目而分散的采购紧密关联。政府采购制度中的集中采购、招标投标等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降低采购支出。另外,要“明资正薪”,公务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所有各种收入透明化,杜绝在国家规定之外自行提高标准或变相发放奖金补贴等,杜绝预算之外的楼堂馆所建设、公款消费、集团消费等一切办公开支。应该遵循货币化的原则,变实物消费为货币消费,变隐性消费为公开消费。要制定真正的“阳光法”^①,使公务人员财产来源透明,建立干部任期前后财产审计等制度,使腐败的“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有效遏制腐败,降低制度外行政成本。

2. 发展电子政务,推进政务公开

实施电子政务的关键就是要对整个政府系统实行全面的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将政府内部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进行重新整合,将人才、资本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形成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聚合经济效应,即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随着电子政务的实行,政府职能将从以管理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并使政府服务更为快捷、畅通、公平,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其次,它将建立网络型组织,减少政府管理层次,撤除合并一些工作职能重复的职位,使组织结构更为扁平化,增进政府的决策科学性和公共政策的品质,极大提高政府的管理绩效。

另外,电子政务可以强化政务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的推行,进而促进廉政与勤政。长期以来,神秘和封闭的行政管理历来是制约我国政府效能的重要因素。它们以行政权力行使的秘密性和内部性为特征,由此成为滋生幕后交易、“信息寻租”等腐败现象的温床^{[18][162]}。政务公开便是实行电子政务过程中的一种管理和制度创新,它允许和保障社会与公众能够得到必要的政务信息和信息服务,加强政

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有效沟通与合作,这样将会大大减少寻租活动、腐败行为发生的机会。191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说:“透明度是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药品。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阳光是最佳的防腐剂。”因而,发展电子政务,推进政务公开,做到“阳光行政”和“透明行政”,会改善政府的服务水平,有效地保证公众的满意度,从而增加社会的安定与高效。

3. 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灵活整合

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最主要的要求至少有如下三点:第一,“由以恩赐官僚制和分赃制为核心的瞻恩徇私式的人事行政,向以人才主义和功绩制为基础的现代人事行政的演化。”第二,“从随意性、或然性很强的人治式行政,发展到系统化、规范化的法治式人事行政。”第三,“在管理方法上,从非科学的经验管理发展到崇尚理性和效率的科学管理。”^{[19][200]}据此,应从制度和操作层面来对公共人力资源管理进行灵活整合。首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拓宽选人视野,探索公务员任期制、试用制、辞退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其次,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对公务员的工作实绩和社会公论等予以考查,并把结果作为晋升、培训和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再者,健全公务员能上能下、轮岗交流和培训教育机制,经常组织公务员学政治、学业务、学现代科技知识,积极构建公务员终身学习体系,引导他们科学把握创新的途径,强化效率观念、服务观念、竞争观念、民主观念以及法治观念等,以改进政府工作方式,不断提高行政管理绩效。

总之,将更新机制、激励—保健机制以及行为调控机制三者有机地融入到公共人力资源管理中,便可为注重行政效益,建设廉价政府提供人才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优化公务员队伍,塑造公务员品质,围绕这一核心要素的追逐与挖掘,能将“成本—收益”分析渗透、内化、深存于激发政府各系统高效运转与配合的过程之中,使所取得的成果更具稳定性、持续性和影响的长远性。

注释:

①“阳光法”,指规定公职人员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的状况,包括财产的数量、来源、增减等情况向指定的监督机关作出书面报告,以接受审查和监督。它是预防和惩治公职人员贪污挪用、行贿、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法律,包括四个部分:履行时就本人和家属的财产状况进行申报登记;在任职期内的收入情况的申报登记;稽查核对;对不诚实行为的制约和监督。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0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2] 焦建国. 降低行政成本: 紧迫性、重要性与根本出路[J]. 改革, 2003, (04): 99 - 104.
- [3] 余天心, 王石生.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EB/OL]. <http://www.theory.people.com.cn/GB/40536/3362184.html>, 2005 - 04 - 30.
- [4] 童大焕. 中国不能掉进高税负低福利陷阱[N]. 潇湘晨报, 2006 - 03 - 29(1).
- [5]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摘要(2001)[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6] 杨眉. 我国行政成本全世界最高 国家主席带头压缩[N]. 财经时报, 2003 - 06 - 08(1).
- [7] 鲁宁. 经济时评: 行政成本偏高 也说“政府浪费”[EB/OL]. <http://www.cctv.com/news/financial/inland/20040330/100036.shtml>, 2004 - 03 - 30.
- [8] 朱坚强. 论行政管理效率观——兼谈我国行政管理效率的现状及其改观对策[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01): 65 - 71.
- [9] 孟金霞. 谁为决策失误负责[J]. 才智, 2004, (11): 23 - 24.
- [10] 胡鞍钢. 中国: 挑战腐败[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11] 马骏. 公共行政中的“生产理论”[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03): 50 - 54.
- [12] 查尔斯·沃尔夫. 市场或政府[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4.
- [13] 平新乔. 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 上海: 上海三联出版社, 1995.
- [14]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 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 [15] 张亲培. 行政改革的深层理论思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0, (01): 63 - 66.
- [16] 毛寿龙. 中国政府功能的经济分析[M].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6.
- [17] 沈荣华. 抓住入世契机 加快推进我国行政改革——“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综述[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 (12): 10 - 12.
- [18] 谢庆奎. 入世与政府先行[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 [19] 张国庆. 行政管理学概论(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 Tendency Towards Execu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YE Yong, WEN Hong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further change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improve the methods of management, introduce e-government means, uplift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 and reduce costs so as to form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featuring standardized behaviors, coordinated operation, fairness and transparency, honesty and high efficiency. Reduc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is, for the first time, officially proposed in the Party and in government's literature, which has key and essential significance in the entire reform. Faced with the common questions of extreme complexity in view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lag influe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barrier essential fa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government systems, establishing a set to have openness and the controllability administrative cost management and the control system requires many kinds of ways to conform, for it is important to consummate our country government ideas and practices and take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y commanding point.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cost; production theory; administrative system

[编辑: 颜关明]